

胡适拜见溥仪引来“炮轰”

接到小皇帝的召见电话

1922年5月17日《胡适日记》曾记载：“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，邀我明天去谈谈。我因为明天不得闲，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。”在溥仪看来，约请胡适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，反正他也不是为了什么要紧事。他只是听家教书先生总说北大教授胡适好生了得，就想着见见他，然后就像个淘气包似的给胡适打了电话。

宣统皇帝虽已退位，但他还住在紫禁城里。那时，电话刚传入中国不久，却没人给溥仪装电话。溥仪嘟囔多时才给装了一部。刚装电话的小皇帝总是好奇，一连好几天电话一声不响，淘气的他坐不住了，拿起电话到处打。他给一个叫“狗子”的杂技小丑打电话，这个“狗子”跟他可好了，“狗子”一来，小皇帝就关上殿门，两个人玩儿疯了。小皇帝想吃烤鸭，给饭馆打电话，让他们送一只烤鸭来。大厨不知这皇上真假，结果没送来。小皇帝笑痛了肚子，拿着话筒不肯放下，可是接下来给谁打呢？想来想去他眼前一亮——打给胡适。

胡适那天正好在家，本来家里电话都是由秘书接听的，巧的是那天秘书外出，于是他本人接了电话。小皇帝在电话中阴阳怪气道：“你可是胡适啊？好极了，猜猜我是谁？”胡适愣道：“您是谁啊，我怎么听不出来？”对方忽然笑起来：“甭猜啦，我说了吧，我是宣统！”胡适大惊：“宣统？皇上？”溥仪说：“猜对啦，我是皇上，你说话我听见了，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，有空到宫里来叫朕瞅瞅。”……

胡适放下电话，像做梦一样，有点不太相信，怕是哪个家伙搞恶作剧。胡适想了半天，给溥仪的洋家教庄士敦打了电话。庄士敦告诉他打电话的正是宣统皇帝。

二人会见引发轩然大波

关于这次见面，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这样记载：

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，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。我问他白话文有什么用，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，等等。最后为了听听他对我的恭维，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，我很愿意多念书。他果然大为称赞，说：“皇上真是开明，皇上用功读书，前途有望，前途有望！”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。他走了之后，我没费心去想这些。没想到王公大臣们，特别是师傅们，听说我和这个“新人物”私自见了面，又像炸了油锅似的在背地里吵闹起来了。

小皇帝召见胡适的消息不但在宫中炸了锅，在文化圈更是吵得沸沸扬扬，甚至出现多种传闻，诸如“胡适为帝师”“胡适请求免跪拜”，一时间好不热闹。对于遗老们来说，胡适是“新新人类”，他们不能容忍皇上受到“污染”；对于身处共和体制下的“新新人类”来说，皇帝是封建的“糟粕”，他们不能容忍胡适前往拜见的奴性行为。两方都恨不得在胡适头上砍几刀。而胡适只是脸红脖子粗地在《努力周报》上辩解：

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，他问起康白情、俞平伯，还问及《诗》杂志。他说他很赞成白话，他做过旧诗，近来也

试作新诗。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，如他出洋留学等事。我们谈了二十多分钟，我就告辞出来了。

一个人去见一个人，本也没有什么稀奇，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，处境是很寂寞的，很可怜的，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，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。不料这件事到了有些人的笔下，便成了一条怪诞的新闻了。自从这事发生以来，只有《晨报》的记载（我未见），听说大致是不错的。《京津时报》的评论是平允的。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，轻薄的评论了。最可笑的是，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，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“新闻”看，还捏造出“胡适为帝师”“胡适请求免跪拜”种种无根据的话。我没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，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，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。

胡适的抗议引来知识界炮轰

时间来到1924年秋天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这场政变给了溥仪最后一击——在遭废黜多年后被驱逐出宫。

溥仪被赶出紫禁城，《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》（下称《条件》）遭到单方面废除，全国上下一片叫好。但是胡适却无法接受。他从报上得到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的消息后，立刻致信中华民国政府表示抗议，认为这是“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”。

胡适的此番抗议立即遭到抗议声一片，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朋友，几乎无一人支持他。他为溥仪的辩护引来全国知识界的炮轰：“一个新文化的领袖、

新思想的代表，竟然发表这种论调，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……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，绝对不应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，皇帝的名号不取消，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。”甚至有人提议将胡适赶出北京城。北京大学的李书华、李宗侗反对胡适的态度更是激烈，他们联名给胡适写了一封信，直言胡适的“抗议”是错误的，同时表达了对一个“新文化的领袖，新思想的代表，竟然发表这种论调”的遗憾。

在铺天盖地的指责声中，胡适也感觉到了压力。不过，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根本，一再强调他其实是一直“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”。但是，他的这个表白更显出他是矛盾的：既然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，那么又为何要抗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。

胡适的抗议没有给溥仪的处境带来丝毫改善，苍白的辩护最终被淹没。

在溥仪被逐出清宫、北京政府筹建“故宫博物院”时，有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胡适写给溥仪的名片，上面写着：“今日因有课，不能入宫，请恕罪。”这个“请恕罪”三字可谓意味深长。

193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，胡适和徐志摩、罗尔纲等一起游景山。站在景山山顶，俯视恢宏壮阔的故宫，一路上笑而论道的胡适突然沉下脸来，低声道：“东北情况严重，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，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，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，我错了！”

时隔七年，胡适终于认错了。

综合自《名人传记》陶方宣/文；《日记的胡适》李伶俐 王一心/编著

清末逛动物园，男女得分开

万牲园（即动物园）于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7月19日正式建成，是当时清政府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之一，是清末农事试验场的一部分。建成之后，清廷敕令各省上供各地的特产动物。慈禧以及一些大臣也向动物园赠送了自己的收藏，比如慈禧喜爱的小猴，内务大臣赠送的八蹄马等，这也使得万牲园的各类珍稀动物愈加齐全。

万牲园正式接待游客后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曾两次巡幸，参观园内的动物、观赏菊花，打赏园内执事人员。

当时万牲园园门外设有售票处和寄存物件处，游人须按时入园，按时出园，到时间不退场者，会被工作人员请出。入园票价为铜元八枚，儿童仆役减半，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入园可以享受免票待遇。这项措施体现了设立万牲园以及农事试验场的初衷，“本场为开通风气，改良农事起见，特于场内附设博览园，以便公众游览，得考察试验之成绩，发起农事之观念。”

清末，万牲园对男女一律开放，可谓开风气之先。不过开放之初，依旧顾虑到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旧礼，男女客分开售票，每周一、三、五、日对男性开放，二、四、六对女性开放。

但是这种男女分开入园的制度，遭到了舆论的反对，当时有报纸对此就提出批评：“男女分日，为地球万国所无。”没过多久，这条规定就被废除，从此开启了中国官方所设公共场所破除“男女授受不亲”旧例的先河。

万牲园的开放，也为京城带来

了全新的生活方式，万牲园内还有各种服务设施，比如设有茶座以及咖啡馆等建筑，还有一处餐厅，中西风格兼备，供游客休憩啜茗。

园中还设有镜真照相馆，它是一座三开间的大楼，楼外有一大庭院，高搭天棚，陈设许多盆花和桌椅，亦可饮茶。馆内陈设十分华美，不仅可以在室内取景，园中景色亦到处可选项，因此被时人誉为“北京第一照相胜境”。不过，照相馆不允许游客自带相机入园，原因是担心“逢人窃照，致招是非”。反对偷拍。而且当时规定，园内可以随意取景，但不许在桥梁道路旁或人多处取照，也不许拍摄其他游客。

当时很多家庭携带一家老小前往万牲园游览，许多外地游客进京也会到此盘桓一番。当时的报纸非常关注万牲园，他们的诸多报道生动地反映了“游人争看万牲园”的情形，还有诸多游人在游玩之后写下详细的游记。

大众的游览热潮也引起了西方的关注。英国的《泰晤士报》1909年9月3日刊发了这样的报道：“北京人，无论男女，另一种爱好的去处是万牲园。万牲园建造于西直门附近，品味绝佳。园中设有餐厅和茶馆，中西式兼备，宾客盈座，充满了生机。”

万牲园开办4年后，清朝灭亡，但是万牲园得以保留。民国时期，万牲园更是成为了青年人情有独钟的地方。据《北京晚报》刘永加/文